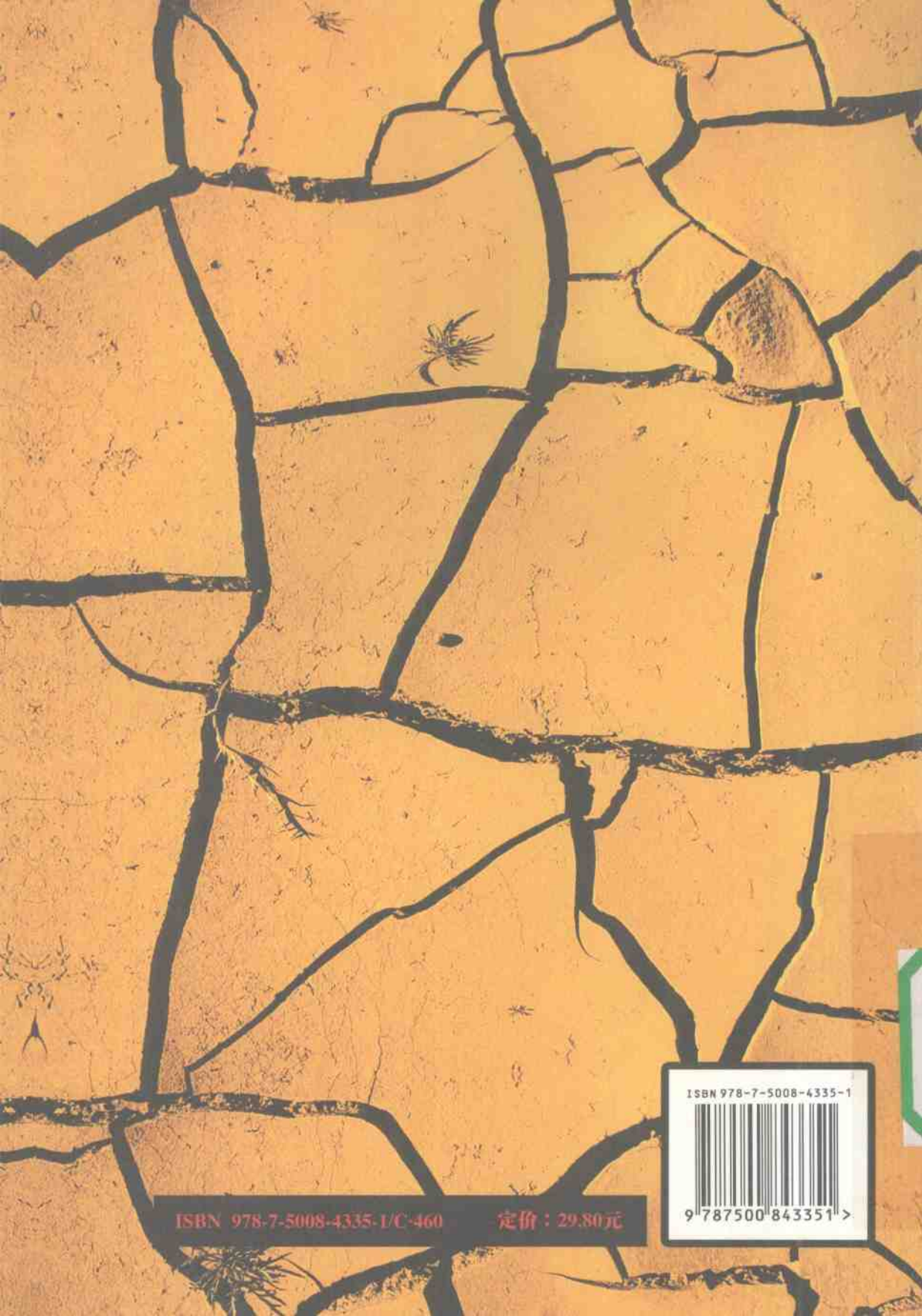
三年难事纪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

主编：潘永修　郑玉琢

中国工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ISBN 978-7-5008-4335-1/C-460 定价：29.80元

ISBN 978-7-5008-4335-1

9 787500 843351 >

三年困难纪事

潘永修　郑玉琢　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年困难纪事／潘永修　郑玉琢主编．—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3

ISBN 978－7－5008－4335－1

Ⅰ.三…　Ⅱ.①潘…②郑…　Ⅲ.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0427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010）62350006（总编室）
发行热线：（010）62045450　　62005042（传真）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字　　数：350 千字
印　　张：20.25
定　　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岁月蹉跎历沧桑 董燕京 / 1
1961 年我高考 王怀远 / 6
难忘的岁月 富志伟 / 10
忍饥挨饿的日子 刘爱民 / 14
怀旧也是幸福的 阮宏喜 / 18
饥荒年月二三事 马元湘 / 21
饥饿岁月留痕 叶金如 / 25
灾年余生 孙连余 / 30
中央国家机关是如何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的 王世发 / 35
久饱记饿 刘进元 / 37
酸楚的记忆 王世杰 / 45
疾风知劲草 患难见真情 白小乐 / 49
三年困难时期纪事 尹东涛 / 55
回忆“三年困难时期” 刘志学 / 58
假期琐忆 邢汝怀 / 61
父亲的七个薯面窝头 韩金瑞 / 65
猪嘴夺食 徐宝春 / 69
在生死分界线上 王双定 / 71
不忘艰苦岁月 珍惜幸福生活 王志新 / 76
别了，饥饿 宗 夫 / 81
那年那月 李桂泉 / 86
饥饿体验 解耀庭 / 89
回忆饥饿 张跟保 / 94
到基层蹲点 同过“五两关” 张春江 / 102
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 王耀峰 / 10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唉，那个年月　苗培兴 / 108
回忆三件往事　王培俊 / 112
尘封的感喟　花墅繁 / 115
艰辛岁月　王成璞 / 119
刻骨铭心的三年　阎书春 / 123
地瓜干　地瓜干（外一篇）　顾文显 / 127
三年困难时期我的家　卢颖超　王淑芬 / 133
荒年追忆　邓宝晋 / 139
结婚琐记　严志清 / 145
五十号备用券　陈祖龙 / 149
“三年困难”实录　陈弘毅 / 150
特殊的任务　张志祥　张嫣 / 156
储蓄艰难　张培修 / 158
票证年代　朱根兴 / 162
艰难的回顾　纪锡清 / 167
峥嵘岁月（下放日记）　啸　原 / 172
又是洋槐开花时　王献振 / 177
忆过去　看现在　望将来　江锡禧 / 180
不堪回首的岁月　李留梅 / 184
革命化的婚礼　黄汉平 / 189
幸福的经典意味　聂炎如 / 192
共和国的艰难岁月　许文正 / 194
苦涩的记忆　张应之 / 199
岁月的记忆　汤　涛 / 204
饿　姜玉芳 / 208
大兴安岭的艰难岁月　田宝升 / 211
留住记忆　潘永修 / 213
在那三年经济困难的日子里　王振学 / 233
难忘的岁月　杨福来 / 238
“左”风毁林千万顷　百鸟飞来无处停　陈鸿钧 / 241
柳树叶　红薯秧　白菜帮　张金声 / 243
偷来的美餐　朱建国 / 245

半筐萝卜 一斤蒸肉 一碗蚕豆饭 施家齐 / 249
一把米 一条命 王德璠 / 252
忆年家坪 王代儒 / 255
岳阳县扭转困难局面二三事 马立强 / 259
三两油票难坏了我 郑 波 / 262
困难时期去当兵 廖明成 / 266
三年饥荒中的一些事 谭荣金 / 270
在那“低标准瓜菜代”的时期 苏佛辉 / 275
狂热的年代 张永隆 / 280
在水族地区整风整社 蒋道征 / 286
走过艰难岁月 刘礼贵 / 292
刻骨铭心的饿 张鸿源 / 296
三年困难时期的记忆 高淑性 / 299
菜疙瘩 高 潮 / 302
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的往事 胡风忠 / 305
三年困难时期的票证 黄挺良 / 309

后 记 潘永修 郑玉琢 / 311

岁月蹉跎历沧桑

北京市宣武区 董燕京

打开尘封的记忆，那段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烙印的岁月，仿佛又呈现在眼前。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遭遇连续三年困难时期。经济萧条，粮食匮乏，副食供应亦十分紧缺——鱼肉蛋奶以及糖果糕点等一律凭本凭票甚至是出生证明限量购买。为响应政府号召，爸爸的粮食定量从三十四斤减到二十六斤，妈妈则从三十斤减到二十四斤。由于我家人口多，我们兄妹七个当时正处于长身体的年龄，各自的那点粮食定量根本填不饱肚子。

二哥对窝头的眷恋

为了把难以果腹的口粮算计好，免得吃亏空，爸爸亲自动手制作了一杆木杆秤，交给妈妈把关，按天把每一顿可吃的大米、白面、玉米面等约好斤两，绝不敢有半点差池。因为我们兄妹七个中仅半大小子就有四个，光吃粗粮都不够，哪还敢吃细粮。所以每个月妈妈都会把大部分米面票兑换成粗粮票。记得那时每天晚饭后，妈妈都要在临睡前做好第二天的早饭——玉米面窝头。而且这窝头也绝对是一两一个按人数做的。

这天又到了睡觉的时候，可二哥躺下老半天也睡不着，尽管晚饭后就着咸菜喝了两碗白开水，总算灌了个饱，可几泡尿下去，这会儿肚子又咕咕叫唤上了。他忍了又忍，终于悄悄从床上溜下地，蹑手蹑脚地掀开锅盖，对着诱人的窝头开了腔："你馋我是不是，你再馋我，咬你信不信？"就见二哥边说边张嘴咬了两小口。那时候日子虽苦，可是妈妈的厨艺非常精巧，她粗粮细作，在每个窝头的尖顶部位摁上一个小坑，再往小坑里捏上一点红糖，这样吃起来格外香甜，也不觉得干硬。或许是二哥这两口下去一下把饥饿和馋虫都勾上来了，随着他"你再馋我，我就吃了你"的

叫声，整个窝头瞬间被他吞下了肚。说真的，二哥的胆子也太大了点，这寅吃卯粮的事儿要是被爸爸知道了，大耳刮子肯定得挨上。第二天一早儿，爸爸和我们每人照常拿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头分头去上班上学，只有二哥咽了咽唾沫，毅然背起书包走出家门。这时，妈妈追了出去，硬是把本该属于自己的窝头塞到了二哥的手里……

野菜充饥与妈妈的病

在最为困难的那三年里，爸爸妈妈为了一家人的吃食，真是愁白了头。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把所能入口的东西都拾掇来当饭吃。记得爸爸每次去昌平的叔叔家，回来时都要带回一口袋麸子，间或还有豆饼以及农村磨豆腐剩下的豆腐渣等。这麸子是小麦磨成面筛过后剩下的表皮和碎屑，也叫麸皮。妈妈将它兑入玉米面，再调剂着花样做贴饼子或是蒸窝头和菜团子。那豆饼、豆腐渣则要掺和到剁碎的白菜帮里，再撒上把盐，上锅熬成糊状，妈妈管它叫渣豆腐。记忆中这是我们平日里常吃的主菜。那几年，爸爸妈妈还常带我们兄妹一起到郊外剜野菜。当时我家住在广安门内的槐柏树街，而广安门外沿着护城河河岸的滨河路即是寻觅野菜的首选去处。野菜的种类不少，我们常能剜到的有荠菜、苦菜、苋菜、马齿菜、刺菜等五六种。随季节变换还要捎带着掐柳树芽、摘槐花、撸榆钱，甚至剥下榆树皮、杨树皮等用来充饥。后来已上初三的大哥承担起了带领弟弟妹妹们赴郊外采野菜的重任。印象里，每次过护城河都要从一处废弃的铁路桥上通过，两根并排的桥梁相距三四米，而每根桥梁的宽度大约仅够一尺，七八十米长的桥面上布满了错落有致的铆钉，桥下十余米处便是湍急的河水。大哥胆子大，走在桥上如履平地，我则小心翼翼一步一挪。记得最初两次，每当走到桥中间往下一看，两条腿软得再也不敢迈步，已到对岸的大哥只得返回来，拉着我的手走过后半程。而妹妹们都要大哥挨个给背过桥。1960 年盛夏的一天，大哥爬到树上摘槐花，当爬到树梢高处时，脚踩的树杈突然“咔嚓”一声断裂，大哥随树杈同时跌落在地。万幸，只是胳膊腿有几处青紫，没伤到要害。怕妈妈担心，大哥还嘱咐我们，回到家里谁也不许提这事儿。

有道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我们一家人想方设法渡难关的当口，一天，街坊报信说西便门粮店来了白薯，妈妈忙把十斤粮票夹在一张五元钱

纸币中，交给二哥让他先去排队。当时一斤粮票可折合换购五斤白薯，十斤粮票能换购五十斤。不料二哥去后排了不多时，白薯即已卖完。回来路过菜站见有处理的西红柿，便自作主张把五元钱给破开了。当他把找回来的钱和西红柿交给妈妈时，妈妈急切地问道："那十斤粮票呢?"二哥闻听有些恍然，忙奔回菜站找寻，可哪里还有粮票的影子。"这不是要俺的命吗!"随着一声凄楚的叫喊，妈妈晕倒在地。这年是1961年，妈妈四十二岁。在那个粮食当命的年代，十斤粮票的丢失，使妈妈在焦急和自责中"作"下了高血压的病根。直到2007年她老人家八十八岁辞世，服用降压药就没停过。

我十岁生日的祈盼

记得那时爸爸工作很忙，经常加班加点或是到各地出差，有时候回来晚了，妈妈就给爸爸煮上一小碗荷包蛋挂面，再点上点儿酱油、醋和香油，看着闻着那叫香！但是当爸爸端起碗将要吃时，看到我们一个个巴望的眼神，又怎么吃得下去。结果大多是给这个吃一口挂面，给那个吃一口鸡蛋，真正能吃到他嘴里的没有两口。当时在我的小脑瓜里就琢磨着，哪天自己也能吃上一碗这么喷香而又高级的挂面呀。转眼间我的十周岁生日就要到了，我向妈妈提出了想在自己生日那天吃一碗荷包蛋挂面的愿望，妈妈也答应了。终于盼到了12月13日这天，中午放学回到家，我便让妈妈给我做生日面。没想到妈妈却说没有挂面，也没有鸡蛋。还数落我说小孩子家，哪有过生日的。看着哥哥妹妹们正在吃的家常饭——掺着麸子的菜团子和稀汤寡水的棒子面粥，我满怀的热切期待一下被失望的情绪所笼罩，不由得跑到院里号啕大哭起来。哭声引来了同院南屋的孙奶奶，当她问明缘由后，把我叫到她家，拿出了半绺挂面、一个鸡蛋外加一包大米花塞到我手上："拿着，别哭了，奶奶给的。过生日应该高高兴兴的。快回去让妈妈给你做了吃。"（笔者注：当年一绺挂面两毛一分钱、一个鸡蛋五分钱、一包大米花四分钱。同院的孙奶奶一家五口，堪称当时的小康之家——孙奶奶在家照看孙子和孙女，儿子儿媳上班，每月收入共计一百二十元。）在我五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十周岁生日和慈善的孙奶奶成了我终生难以忘却的纪念。

沧桑历尽渡难关

三年困难时期，全家九口人就指着爸爸每月七十元的工资生活，妈妈操持着一家人的吃穿零用，那真正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把心都操碎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家里买菜，从来都是直奔撮堆打捆或论筐卖的处理菜，除非家里来了亲戚客人，那光鲜水灵的青菜几乎与我家绝缘。荤腥也难得一见，但大油和肥肉却不能不买，炼出的油用来炒菜，大油渣和肥肉渣还可用来蒸包子。而穿的方面，从裤褂到鞋帽，全靠妈妈自己做。而且多年都是哥哥姐姐替换下来的衣服和鞋袜，再给弟弟妹妹穿。那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衣服和鞋袜上很少不带补丁的。多少个深夜，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总会看到妈妈仍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针针一线线为我们缝补衣衫。妈妈是个极要强的人，即便是打个补丁，也特别注意针脚的疏密和补丁的式样，旧衣服虽褪了色，但也要洗得干干净净，再熨得平平整整，以免我们穿出去让人笑话。

生活的艰辛与磨难，并没有压垮妈妈，反而使妈妈变得更加坚毅与豁达。为补贴家用，妈妈从街道合作社和附近工厂揽下了四五种加工活儿拿来家做。主要有纳鞋底、缝皮子（将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零碎兽皮等手工缝制成手套、坎肩或皮衣）、折页子及糊纸盒等。纳鞋底、缝皮子技术要求高，质量要求严，因此这两样活儿妈妈都是亲手做。当时纳一双鞋底一毛钱，缝一件皮衣一毛五分钱。为了能多挣个块八毛钱，妈妈简直是豁出了老命，早起晚睡，没白没黑地干。而糊纸盒、折页子（印刷厂装订书籍的一道手工工序）这样简单的活儿，我们众兄妹放学或做完功课后都要上手干，一来是为妈妈爸爸分忧解难，二来也是要通过自己的劳动，挣出我们的学杂费和书本钱。自揽下加工活儿后，家里就变成了车间，桌椅板凳和铺板都成了我们的工作台。记得妈妈给我们规定每人每天的工作量一般是，糊纸盒一百个或折页子一千张。因为糊一百个纸盒和折一千张页子的工钱一样，都是一毛钱。这样，四五种活儿干下来，全家每月能增加收入三四十元，妈妈的眉头也稍许舒展了一些。

为了奖励我们兄妹对家里做出的贡献，妈妈决定，每月月末领来工钱后，全家可以不限量地敞开肚皮吃一顿细粮。这一决定让我们感觉就如同过年，一个个欢欣雀跃，笑逐颜开。月末这天中午，妈妈先熬好了一大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米粥，然后就开始烙馅饼，以便我们兄妹陆续放学随到随吃。我和三哥是先回来的，正吃着，从十四中放学回来的大哥透过门玻璃看到了，他急不可待地拉开门一个箭步蹿进来，就听“吱”的一声惨叫，家里养的一只雏鸡被他踩在了脚下……三哥这天显得特别乖巧，他不声不响只顾埋头用餐，从第一个坐下吃到最后一个吃完。因为妈妈有言在先不限量，结果这顿饭，十一岁的三哥竟然吃了七个馅饼、两张白饼，外加三碗粥，吓得妈妈直怕他撑坏了肚子。要知道，由于长时期处于饥饿状态，妈妈爸爸和我们因营养不良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浮肿病，脸上以及胳膊腿上，手一摁就是一个坑，半天弹不起来，以至全家每天都要熬上一大锅中草药进行治疗。现在抽冷子吃这么一顿足实的，搞不好还真怕发生意外。

说来，我家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境况还不算最差的，至少没有一个人被饿死。仔细回想，这与亲戚朋友的资助和爸爸单位所给予的关怀是分不开的。特别是自全家闹浮肿后，爸爸及我们全家被单位列为重点优抚对象。爸爸上班，机关食堂每天午餐免费供应浮肿病员一张用黄油烙的小饼，并限定必须当时吃掉。逢年过节，机关领导都会将几十元补助金和几斤青海黄鱼及黄豆、小米、大枣之类的营养品送上门。这可不是什么作秀，而是实实在在的雨中送伞，雪中送炭！

世事沧桑，岁月蹉跎。当饱蘸着泪水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的心久久难以平复……

1961年我高考

北京市房山区　王怀远

我的家乡在房山区周口店镇南边的一个自然村——瓦井村。村西是以裸露的岩石为主的山脉，在岩石的沟壑处积存的一点点泥土上稀稀落落地生长着丛生的酸枣树和荆条。它们靠着老天恩赐的雨水顽强地生长、开花、结果或结籽；村北是夹杂着石子的褐红色黏土，雨天土地像一片稠稠的糨糊，晴天土地又干又硬像水泥板，连小草都很难生长；村东是一大片由大小不等的河卵石铺成的荒河滩；只有村南是一片比较肥沃的土地，全村三百多户人家的吃粮穿衣几乎全靠这几百亩土地供给。

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人都是热爱自己的故乡的。但是由于科技水平和生产力的落后，家乡的贫困面貌很难得到改变，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人们的生活还能勉强过下去，但遇到自然灾害，高山、红土、河滩似乎和人们的脸色一样，显得那样的阴沉与无奈，但又以顽强的毅力和老天抗争，祈盼着美好的明天。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家人口比较多，除父母外，我上有奶奶，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全家八口人就靠父亲一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维持生活。平时没有现金收入，吃盐买油等全凭鸡屁股——即养鸡下蛋，用鸡蛋去换油和盐。到年终结算时，扣除全家人的口粮钱后年年都要欠生产队的钱，生活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在兄弟姐妹中我最大，我和妹妹上高中，二弟上初中，还有两个弟弟上小学，这无形又加重了家庭的负担。我本想不上学了，回家挣点工分以减轻父亲的负担。但父亲思考了好几天，最终还是让我把高中念完，理由是上学吃食堂（当时农村都吃食堂），回家挣工分也是吃食堂，反正都是吃不饱，还不如把高中念完。高中毕业后万一能考上大学或能分配当小学老师，起码能吃商品粮，先解决一个人的吃饭问题。我也把能吃商品粮、尽量不饿肚子作为继续读高中和考大学最直接的原始动力。

1961 年农村不吃食堂了，从生产队分粮食回到自己家里做饭。那年我在周口店中学准备参加高考，妹妹在这所学校读高一，二弟在娄子水中学读初中。因为我们兄妹三人中午要带一顿干粮，所以填饱肚子是全家的头等大事。

那时的学习压力不像现在的中小学生那么大，负担重与否很大程度上靠自己去把握，最大的困难是吃不饱饭，浑身乏力，精力不易集中。当时农村中学生的口粮标准是每人每月十八点五斤原粮，即没有加工的粮食，如玉米、豆子、稻谷等，老人和小孩的口粮标准更低些。为了让我们三个上中学的孩子多吃点，母亲费尽了心思，家里吃稀粥，省下玉米面每天蒸六个窝头，我和妹妹弟弟每人拿两个去上学作为中午的干粮。为了把窝头做大点，母亲把捡回来的大葱根须都洗净切碎掺到面里去了。大妹妹比我小两岁，为了让我多吃点，每天上学前她都拿一个半窝头，另半个放在我的干粮袋里。二弟也很自觉，既不跟我争，也不反感，自觉拿两个窝头就走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支持我更好地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

我们对这样的艰苦生活没有什么怨言，因为整个社会都在困难时期，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也感觉不到有什么心理不平衡。

既然把能吃上商品粮、不饿肚子作为考大学的直接动力，我就以极大的毅力和韧性投入到备考当中。每天往返步行二十四里去上学，也不感觉累。

当时村里虽然通了电，但电力不足，三天两头停电。即使不停电，灯泡也像萤火虫的屁股，一朵泛红的光亮下，根本看不清书上的字。备用的煤油和蜡烛连照明都舍不得用，更不用说点它来复习功课了。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在学校我尽量把当天的作业做完，有疑难问题请教了老师或同学后再回家。为了节电，为了省点煤油和蜡烛，我就利用上学、放学在路上的两个多小时念书，有些古诗词、现代文的精彩句子、俄语词组至今不忘。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确实动了一番脑筋。我理科学得不好，尤其是化学和物理，怎么学也不开窍，拼死拼活也就是六七十分的成绩，报考理工院校根本没有希望。如果想上大学，只有报考文科才有一线希望。而报考哪所大学又是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报考外地院校，寒暑假往返的路费和平时的伙食费家里根本负担不起，报考北京的知名大学，一是不一定能考得上，二是吃饭的问题解决不了。思考良久，我清一色地填报了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三所师范院校。原因只有一个，

上学吃饭不花钱，不交学费，国家每月给的十二元五角伙食费足以维持生活。万幸，我被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录取了，实现了能吃商品粮、不吃十八斤半带皮的原粮的愿望。

接到高校录取通知书无疑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我们村有七八个同学参加高考，只有我和崔振刚被高校录取，成了这个村有史以来头两个大学生，左邻右舍的夸奖不绝于耳，心里怎能不高兴呢！但我的心里却增添了忧愁，父亲的话语少了，脸色阴沉多于晴朗，我明白他是为我上学的费用在发愁。从农村到城市里去读书，起码要有一身干净的换洗衣服、替换穿的鞋、洗漱用品等，还要买书和文具，这些都需要钱。我知道父亲在发愁，我只能小心翼翼，不敢打扰。

过了三四天，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对我母亲说："初九是长沟集，把猪先卖了吧，怎么也能卖三十块钱。"过了一会儿，父亲像是和我母亲商量，又像是自言自语，不紧不慢地说："借他二哥的三块钱都快两个月了，有了钱得先还给人家。还得买个小猪崽，空着猪圈连点肥都积不了，秋后种麦子怎么办？"母亲也低声接着说："家里一滴油都没有了，都十天半月没烙饼吃了。"我在一旁听着，不敢搭腔，心里却在盘算着，猪还没有卖，钱还没到手，早被安排得一分不剩了，我上学的钱还是没有着落。

屋里灯光很暗，院子里传来脚步声，是隔壁李婶来串门。母亲赶紧收拾碗筷，结束了这沉闷的氛围。

在等待到北京师范学院报到的日子里，我尽一切可能多干一些家务，挑水扫院子就不用说了，一有时间我就背着荆条筐到村外割猪草，争取让猪在卖之前多长几斤肉。然而，就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我犯了一次终生难忘、终生自责的蠢事——偷生产队的白薯叶，被看青的生产队长逮个正着。

8月上旬的一天中午，太阳高照，地面晒得很烫，在树荫下坐着也是大汗淋漓。我索性背着筐到村外去打猪草。到了一块庄稼地旁，感觉像站在蒸锅上，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像眼前失去支撑力的玉米叶子一样，瘫软地坐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忽然眼前一亮，不远处的白薯地吸引了我，顿时心生贼念，想偷割点白薯叶放在筐里，上面再放青草作掩护，回家后放进玉米面蒸窝头吃又能省点粮食了。不知思想斗争了多久，四下观望没发现有人，我终于贼胆变大，下手割了起来。当我割了多半筐时，忽然从玉米地里出来一个人，正好是生产队长。他本来气势汹汹，一看是我，什么也没说，扭头又走了。

我从小家教很严，不会骂人，更不敢和小朋友打架。胆小怕事，不敢招惹是非，一直被左邻右舍称为好孩子。一墙之隔的生产队长是看着我从小长大的，他的宽容更引起了我的内疚，真是欲哭无泪，入地没门，羞耻到了极点。我把割下的白薯叶放在白薯秧上，起身要走。就在我准备回家时，生产队长又出现在我的面前，把我放下的白薯叶一一拾起来，放进我的筐里，只说了一句话："快点回家吧，大中午的别热坏了。"他走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哭了起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偷东西，还被人家当场逮个人赃俱获，都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放弃了做人的尊严。时间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偷过东西的耻辱总也挥之不去，成了我永远的遗憾。

离到北京师范学院报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全家人为我做临行前的准备。母亲把一个陪嫁用的木箱子腾出来，让邻居郅大叔锯矮点，以便能放进床底下。妹妹把她的一件上衣拿到张裁缝那里，把圆领改成立领，下边的两个衣袋口是斜的，人家说改不成男式的立口袋，只好把这件男不男、女不女的上衣放进箱子里，为了能省几个钱，我花一元钱买了二十张糊窗户的大白纸，用线缝了七八个八开的笔记本。又买了一袋牙粉、一块肥皂、一条毛巾，七装八装也没装满半箱子。剩下的时间就等着临走时父亲能给我多少钱了。

1961 年，周口店已经有了通往北京城区的长途公交车。为了节省路费，临上路的前一天晚上，父亲给了我七元钱，还告诉我："明天村东头老张家的马车去长辛店，我跟人家说好了，你坐人家的马车先到长辛店，再打听坐哪路车能到学校，这样能省几毛钱。"

1961 年 8 月 31 日，我怀里揣着七元钱，手里抱着木箱子，心里装着能吃上商品粮的愿望走进了大学的神圣殿堂。

经常听人说，苦难是人生中的一笔巨大财富。我不敢完全苟同，只能说苦难能磨炼一个人的意志，但它绝不值得留恋，更不应该去追求。苦难应该有一个底线，那就是能保证人们起码的生存和发展。我更赞成邓小平的论断，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才是我们的理想。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的往事，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加珍惜改革开放开创的新局面，用我们勤劳的双手和理性的智慧去创造更加富裕、更加和谐、更加文明的明天。

（作者系北京市大兴一中退休教师）

难忘的岁月

北京市朝阳区　富志伟

1959年夏天，我高中毕业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入学后不久就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在那难忘的岁月里，给我留下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吃粥”。

20世纪60年代，师范类院校都是免费的，不仅不收学费，而且包吃包住，只要能考上，就可以享受这种待遇四年。

当时的师院，食堂和礼堂合二而一，全院学生一日三餐都在这里解决，一千几百口子的饭可不是简单的事。食堂里没有椅子或凳子，只有几十面方桌，横成行竖成列地分布在舞台下，大学四年我们始终站着吃饭。

在礼堂开大会或听报告时，每人才从宿舍带一个小方凳。礼堂小，坐不下，来晚了就坐在外边听扩音器。

大二时，粮食紧缺，副食匮乏，早中晚餐都没有干粮，一日三餐全是菜粥。粥还比较稠，除了菜叶，偶尔还能见到一点点罐头肉糜。但每餐每人一碗，不可重打。

那时，每离开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呢，食堂门口就挤满了人，专等填肚子。到点了，大门一开，学生们就像闸门放水一样涌入，每人飞快地跑到食堂两侧碗架，争先恐后取出自己的饭碗、饭盆或饭盒，排队等候打粥，队很长，每队都有几十人。一排方桌把发粥人与学生隔开，十几桶稠粥盛在特大的木桶里，热气腾腾。

打粥用的勺是用圆铁罐头盒做成的，盒外边垂直钉上一根半米多长的木棍，就像过去副食店里打酱油用的提勺，但比那个大得多。罐头盒直径约有两手拇食指对接成的圆那么大，大约有十二厘米，高约七八厘米。打粥时，快速提起倒在碗里，还是不少的。

大师傅人力不够，就让学生干部负责打粥。我们就选有力气的男同学干这活儿，我也当过打粥服务员，右手把提勺伸进粥里，左手赶紧把饭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